

追尋半世紀的蹤跡：
評王晴佳，《臺灣史學 50 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

歷史文化叢書 20，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267 頁。

汪榮祖*

這本書從題目看，顯然要總結五十年來史學在臺灣的總體發展，也就是要寫一部 20 世紀下半葉的臺灣史學史通史。然而，本書作者在序言裡卻說，無意對臺灣史學「作一總體評述」。固然，沒有一本史學史通史能夠包含各個方面、巨細靡遺，但必須對整體有所觀察、有所了解、有所分析、有所識見，然後取樣作重點述論；而所取之樣，自然應是半世紀來臺灣史學在各方面的代表作。作者謙稱：「因為限於學力，筆者無力作此類〔半世紀來的臺灣史學〕的概括和評介」，然同時又說：「希望能指出其發展的淵源、變化之原因和未來之趨向」，則又是何等抱負！但是如果對整體不能有所概括和評價，作者自期的抱負又如何能夠付諸實現呢？其結果是，全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靠對某一些史學工作者的訪談，不僅內容受到被訪者的牽引，更缺乏批判性的獨立論斷，至於訪談不到的部分，也就只好付諸闕如了。

歷史如江水東流，固不能抽刀斷流；然為了彰明歷史的發展，史家必須斷代分期。但是分期並不容易，因各時期必須名實相符，又必須確定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的分水嶺。五十年來的臺灣史學不是一個短時期，自然需要分期，以看出發展的過程。作者分之為三期：1950 至 1960 年代中期為初創時期，即上編所述；1960 年代中期至 1987 年為社會史興起時期，即中編所

* 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

述：1987 年以後為臺灣史興起時期，即下編所述，然作者自稱「在篇幅上則厚今薄古」。的確，全書二百餘頁，下篇佔了一百餘頁。這與題目並不很相稱，要寫半個世紀的臺灣史學史，當然要講究平衡；否則，何不逕稱「臺灣本土史學的興起」，以前兩期作為陪襯呢？

何謂初創？

所謂「初創時期」，並不甚恰當；1950 年之前，臺灣已有史學，不能謂之「初」；若不算日本殖民時代，臺灣之重歸中國版圖是 1945 年，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陸遷臺史家在此之前或稍後均已抵達，作者以 1950 為斷，似乎只是要取半世紀的一個整數。作者既以此一時期的主流為傅斯年一派的所謂「史料學派」，來自大陸，則又不能稱之為「創」。其實，遷臺的大陸史家不只是以傅斯年為首的北大、清華派，南京中央大學一派由於朱家驊的關係，實先已佔領了光復後臺灣的史學陣地；旋因種種緣故，北派反客為主，獨領風騷，而此種種緣故正待史學史作者考而得之，僅靠訪問某一些史學工作者，不可得也。

饒有趣味的是（這是在本書裡常見的口頭禪），以「史料學派」為主流的「初創時期」，也就是此書上編「科學傳統的建立」所述；按題目所示，居然建立了科學傳統，該是何等成就！然本書作者對科學的概念，顯然是十分寬廣的，所以他把康、梁的進化論史觀、梁啟超提倡的「新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都算作科學的史學（頁 8-9）。但是傅斯年對科學的理解是英文字定的義，他要把史學建立成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不僅僅是考訂史料、追求真相為目的而已。胡適於五〇年代在臺大法學院禮堂講史學方法，敝人曾恭逢其盛，他講了一大堆化學方法，至今記憶猶新。這種科學史學近代西方也有，傅斯年實借自西方，但早已證明是走不通的死巷，若謂科學的史學已經建立，未免聳人聽聞。

既然肯定科學史學已經建立，當然不必去追究其失敗，而失敗乃無可否認的事實。傅斯年一方面將史學等同史料學，另一方面又要建立科學的歷史，兩者之間的關係此書並未交代清楚，亦因而看不到其間的謬誤與錯亂，

以及嚴重的後果。什麼嚴重後果？傅斯年心目中的科學史學既未建立，而史學已經淪落為史料編輯學，史家認為史料自己會說話，誤以為收集資料就是研究。大家一意讚美傅斯年而不肯去批評他，又如何能洞悉問題的癥結所在呢？

五、六〇年代是冷戰時代，兩岸對峙，白色恐怖籠罩，然而對白色恐怖給整個史學界所造成的影響和後果，本書卻著墨無多，甚至認為白色恐怖的壓制造成反效果，自由派史家反而被年輕學子奉為學術的正統，「這一『正統』，就是要以追求純粹學問為目的，不曲學阿世，不急功近利，完全以科學的標準出發來面對事實，保持客觀的態度和嚴謹的治學風格」（頁34-35）。我們真希望五、六〇年代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正統」，可惜只是鏡中的花月而已。整個學術界除了極少數幾位敢於挑戰當權派的意識形態外，就史學界而言，在白色恐怖下是望風披靡的，不敢碰禁區的，不敢很客觀的，不僅出版須經過嚴格的審查，有時甚至曲學阿世。即使到1985年，臺灣七個歷史研究所的所長仍在政府的動員下在報上發表聯合聲明，駁斥一位外國作家所寫的《宋氏朝代》(*The Soong Dynasty*)，使這本原無多大學術價值的通俗作品，反而聲名大噪。類此史學家「身不由己」的事例應該是史學史作者饒有趣味的題材，但均不見於本書。在那個時代，不肯曲學阿世的歷史學者，也許只能不表示意見，不作歷史解釋，於是史料收集與編輯正好成爲一種躲避白色恐怖的「避風港」，而非作者所說，只是因爲推崇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而接受史料學派（頁38）。於此可見，在戒嚴時代的環境裡，所謂「史料學派」尚有抗拒政治壓力的因素在焉！

如何轉折？

中編的標題是「科學史學的轉折」，內容敘述如何自六〇年代中期開始轉折到社會科學史學。令人不解的是，如果科學史學已經建立，爲何有此轉折？顯然是因爲想要以史學等同史料學的辦法來建立科學史學是失敗之舉，導致不滿，而後才有轉折。史學史作者理應要將此轉折的發生、過程、

影響以及落實，說清楚、講明白。但本篇一開頭就提錢穆，說是錢穆在六〇年代的影響，與史學界反省「史料學派」有關，接著便無下文；隨即轉到殷海光，肯定殷先生是「歷史科學化運動開路的先知」，而這「歷史科學」並不僅僅是社會科學（頁 45）。以錢、殷兩先生爲此一轉折的淵源，實在令人費解；因社會科學既與錢先生無緣，而史學又殊非殷先生之所長。

此外，以六〇年代中期爲轉折的開始，似乎也沒有嚴格的標準。作者主要以 1963 年創刊的《思與言》，1971 年復刊的《食貨月刊》，以及 1979 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作爲標誌。這些期刊的作者大都曾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留學，自然介紹了一些當時正在西方興起的社會史研究，以及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然而這種譯介既無系統，也不夠深入，作者也認爲真正能運用新的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的，並不太多（頁 75）。既如此，則又如何落實社會科學史學的興起呢？難道「史學不僅要『敘述』，而且要『解釋』」（頁 51），就算是社會科學史學嗎？

本書作者提到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一文，惜未深究其意義（頁 54-55）。此文原是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四十週年紀念會的學術演講，其內容有不少費解處，若謂「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並不盡然；近代中國之世變，不可謂不急，而史學似乎變得並不快，只是在歐風美雨下慢慢的在變，所謂「乾嘉餘孽」之譏，不一定公平，但至少可見近代中國史學之變也，殊緩。不過，沈先生在這一場合，明確地質疑所謂「史料學派」。他說史料無法求全，也不盡可靠，所以「史學很難成爲純粹的科學」，清楚地否定了傅斯年所倡導的史學即史料學。沈文發表在 1968 年的史語所集刊第四十本上，也許我們可以說：「史料學派」在這一年象徵性地結束了。

沈先生否定傅先生的「史料學派」，是史學內在理路的自然發展呢？還是由於外燦的因素呢？沈先生的「內在理路」似乎發展不出社會科學史學，就在他這篇演講稿裡，他認爲經濟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科學基礎還沒確立」，「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法子使人類的歷史也同自然界的歷史一樣，成爲一門完全信而有徵的科學」，足見沈先生心目中的科學仍然是純粹的自然科學，而他仍寄望於科學的史學。此外，我們須知沈先生一直是臺灣大學的

文學院長，可說是史學界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在威權體制下，他的壓力要比一般的史學工作者大得多，威權體制要他帶頭學以致用，在蔣公領導下為反共抗俄大業盡一份心力，他能始終堅守「避風港」嗎？沈先生的演講未嘗不是對壓力的表態，那一期史語所集刊封面印有「恭祝 總統蔣公八秩晉二華誕」字樣，恐非巧合。至 1976 年之秋，蔣介石已經逝世一年多，沈先生仍然在《中央日報》撰寫〈紀念蔣公九十誕辰頌詞〉，四言四十八句，頭四句是「天佑中國，篤生蔣公；允文允武，立德立功」。這與郭沫若歌誦毛澤東有何基本上的不同呢？基本相同的是史學家在政治高壓下，鮮能不曲從表態。在解嚴之前，政治與史學研究的關係密切到不可忽視的地步，任何認真的史學史作者如何能夠輕忽呢？

轉折之後興起的社會科學史學的具體成就如何？本書作者於浮光掠影式的介紹之餘，即作結論道：這一期社會科學史學，雖用新方法寫歷史，但「並不多見」，「成果也良莠不齊」（頁 76）；然則所謂「科學史學的轉折」亦不甚成功。既然如此，如何能稱之為「社會科學史學之興」呢？不過，作者話鋒一轉，說是由於留美華裔教授回臺講學，促使臺灣史學界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對西方學界的興趣，「有一浪高過一浪的趨勢」，增加對新方法的「敏感度」（頁 76）。照此說法，六〇年代的轉折的主要動力，又來自華裔教授。不過，他所舉的這些華裔教授，莫不是用一些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史，這也是當時西方漢學界治史的風尚，而開風氣之先者，乃華裔教授何炳棣，先後寫出基於社會科學的中國人口史論與用社會流動理論寫出的明清社會階層兩書，後書雖至今尚無完整的中文譯本，但英文原本對這一時期臺灣史學界研究社會經濟史者，早已有很大的影響，而寫這本史學史的作者卻漏了這條大魚。

既說以社會科學治史之不足，又要寫社會科學史學之興，當然十分辛苦，亦不免矛盾錯亂。如謂「在當時史學走向自然科學的風氣影響下，他們都傾向認為歷史著述不應再以敘述故事為滿足」（頁 57），讀來真似一頭霧水，似乎忘了「當時」已是六〇年代中期以後，怎麼又回頭走向自然科學？

不論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難道只要求史家不敘述故事？而前一期所謂「史料學派」當道時，並不主張「敘述故事」，何「再」之有？接著又說到余英時宣揚「史無定法」，否定社會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由於余氏在臺灣史學界的影響極大，對社會科學史學「無異是當頭棒喝」（頁 80-81）。然則，六〇年代中期以來所謂「轉折」的意義何在？在「不足」與「否定」下，社會史如何「興起」呢？史學領域又如何「擴大」呢？總要有一個明確的交代吧。

其實，中編的第五節「鄉土文學與認同意識」已不談什麼社會科學史學，大都是節外生枝，大談鄉土文學而並沒有扣緊與史學的關係（頁 117-119）。第六節「政治變遷中的歷史意識」，亦溢出中編的主題之外，實已提早進入下編的範疇，在在顯示作者謀篇之不夠嚴謹。

認同什麼？

篇幅特長的下編是「走向民族認同」，此期從 1987 開始，乃因該年是解嚴年，不僅僅史學界，整個學術界自然會有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而寬鬆的新環境。由本土化運動促使臺灣史的興隆，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只是此編所述有不少是談政策與計畫，讀如制度史而非史學史。也有不少是所謂臺灣史與中國史對抗的統獨論爭，又不厭其詳地談臺灣歷史的主體性，以配合臺灣獨立的主張，則讀如政治運動史。解嚴之後，臺灣史在沒有壓力的環境裡得以發展，乃五十年來臺灣史學的一個新里程碑，史學史作者自應網羅臺灣史純學術的新收穫，對其資料的運用，理論的採擇，以及書寫的方法作深入的分析與介紹。但這些議題在此下編，著墨無多，著墨較多的是臺灣史如何成為臺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的學理基礎，但又雅不欲明言以論帶史之事實。史學為政治服務的現象，史不絕書，近代尤盛，史學史作者正應效南董之筆而書之啊！

本土運動促進臺灣史研究，其勢必然；然而說臺灣因為失去「正統中國」的地位，所以中國史研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則甚離奇。若謂「如果臺灣不再能代表中國，不再是中國研究的『實驗室』，外國研究中國的學者

也不再到臺灣從事研究與培訓，那麼臺灣仍然堅持中國史研究，還有什麼意義？」（頁 184）難道在臺灣研究中國史的意義是爲了培訓外國學者以及爲外國人提供「實驗室」嗎？這豈不是太離譜了！又說大陸開放之後，發現資料既繁又多，因畏難而不願從事中國史研究（頁 184），更是不可思議。蓋治史者無論中外，只患史料寡而不患多，史家處理史料如韓信點兵，多多益善耳，豈有畏多之理？又說年輕學者對政治軍事史已不感興趣，所以檔案開放對他們並無多大吸引力云云（頁 185），作者似不知近年開放的檔案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經濟史料，據之而成的著作，亦已頗爲可觀。

至於下編提到的中研院近史所「中國現代化之區域研究」，無論就時間或內容而言，應該放在中編述之。因爲這是用社會科學方法治史的一大計畫，規模龐大，歷時長久，但並不很成功。主要是理論與資料之間難以配合，往往只能排比堆砌史料，國際學界評論也有微詞，整個計畫亦未完成。而本書作者譽之爲：「不僅在臺灣史學界聲名遐邇，而且也名聞海外」，並於 1990 年「劃下了一個光彩的句點」（頁 201-202），未免溢美過甚。

此編最後集中討論認同問題，詳則詳矣，惟頗多枝節，未盡扣緊史學，大都可視爲統獨論爭。作者見到「同心圓」理論，驚爲「首創」（頁 220）；其實，以史觀而言，乃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我族中心論」(ethnocentrism)。近代歐洲中心論昌盛，即以西歐爲同心圓的核心，以中東爲近東，即同心圓的中層，以東方的中、日、韓爲遠東，即同心圓的外層。中國人像歐洲人或美國人一樣，也以本國史爲核心，不足爲奇，而同心圓理論在九〇年代臺灣的意義乃是以臺灣人取代中國人，以臺灣史爲核心，並驅中國史於核心之外，實不足以稱之爲史學理論。統獨論爭，既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故認同也無交集，以致於所謂「走向認同」者，實際上是走向不認同，恰與題旨相反，不亦怪哉！

結論

本書敘論五十年來臺灣史學的發展，經過三個時期，到書尾突然看到這

樣一段結論：

臺灣史學的發展，一直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展，而這一科學化傾向，又一直未能真正擺脫「史料學派」的模式。196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科學予以史學以強大的衝擊，但持續十年以後，便開始為人所不滿，加以反省。而反省的結果是尋求「社會科學的中國化」，也即把「史料學派」所代表的考證史學重新扶為正統（頁255）。

如此結論，真是有看沒有懂，如果「一直」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展，「轉折」又從何而來？如果「一直」，應該貫穿三個時期，何以見不到「一直」的線索？所謂社會科學的衝擊，不過是用一些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歷史，照作者中編所說，搞這一套的人並不多，又「良莠不齊」，則何從對社會科學有所不滿，又如何尋求「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皆無說明，更不知社會科學中國化與史料學派所代表的考證史學扶為正統之間的邏輯關係，實在令人無限迷惘。